

D000304 HKP13

中美關係

世紀之交的反思

中國旅美學人談



徐德清 洪朝輝 姜衛民 主編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世紀之交的反思

中國旅美學人談中美關係

徐德清 洪朝輝 姜衛民

主編

Living with Differences:

China-U.S. Relations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Deqing Xu, Zhaohui Hong and Weimin Jiang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世紀之交的反思
——中國旅美學人中美關係

編者 徐德清 洪朝輝 姜衛民
出版者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1060 Main Street, River Edge,
NJ 07661, USA
印刷 Fuisland Offset Printing (S) Pte. Ltd.
初版 1998年9月
國際書號 ISBN 1-879771-26-8
版權所有 ©1998 Global Publishing Co. Inc.

序言

我們，一群來自中國的旅美學人——生長在本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備嘗“文革”的十年艱辛，歷經工農兵的全面磨勵；我們，又是改革開放和中美關係緩和的直接受益者。改革了，我們有幸成為“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開放了，我們遠渡重洋，留學美國。

十餘年的“洋插隊”，我們取得了博士學位，並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任教任職。但是，我們並非一個獨特的群體。我們和曾來美國、正在美國和將來美國學習、訪問、旅遊和考察的無數中國人一樣，情結四海，根繫中華。因為，我們共有長城的骨架，黃河的血脈。我們希望衝破阻隔中美對話的“牆”，成為溝通中美交流的“橋”，過去，面對中美關係這盤眼花繚亂的棋局，我們曾在理性和感性兩極游移，也曾在沉默和吶喊之間猶豫。如今，我們難以坐觀“棋”變，我們要表達我們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慮，影響這盤氣勢恢宏、意義深遠的棋局。

世紀之交的中美關係，已經走出對弈雙方的長考和不戰不和的僵局，進入了雙方重新落座、另行佈子、以及合作謀篇的新局。這是衝突較量後的智慧顯示，這更是冷靜思考後的理性選擇。歷史的洪鐘，即將撞開二十一世紀的大門。中美兩國也將跨入一個互相理解、良性合作、互補長短的新世紀。這是一個趨勢，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趨勢。這更是一個潮流，一個不因世界格局變動的潮流。

瞭解，祇能而且必須是雙向和均等的——中國要瞭解美國，美國也需要瞭解中國。

有瞭解，才可能理解；有理解，才能走向合作。讓中國瞭解美國，讓美國瞭解中國，這既是我們的使命，更是我們的優勢。如今，美國要什麼？美國要“守成”——守住戰後極盛之成，防患未然；中

國要什麼？中國要“守拙”——守住謙遜忍讓之拙，韜光養晦。中國不必唯唯諾諾地事事說“是”，也不用阿Q式地處處說“不”。除了“是”和“不”，我們可以說的還很多。中國面臨的真正挑戰是，怎麼說、說什麼？

中國應該怎麼說——我們如是說——從歷史文化、政治法律、社會經濟、國民外交，全方位、多層次地說出我們的感性話語、理性觀察和政策建言。希望我們的觀察是客觀的，因為我們長期生活在美國；希望我們的看法是公正的，因為我們面對的是祖國和居住國；也希望我們的建言是理性的，因為我們是長期從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研究的教授和學者。

中美友好，對中國有利，對美國有利，對世界有利，對往來于中美之間的我們也有利。

我們的宗旨祇有一個——增進瞭解，促進和諧。

中國走向世界，中美關係是盤大棋。下好這盤棋，需要智力和毅力，也需要耐心和信心。

我們的經歷，決定了我們的使命。中華民族的振興、中美關係的改善、以及世界範圍的和平與發展，呼喚我們的參與。

我們別無選擇！

目 錄

序言

上篇 社會與文化

第一章 知己知彼，求同存異：由《中國可以說不》引起的思考 1

- 一、引言
- 二、冷戰戰後中美關係如何定位？
- 三、如何認識美國？
- 四、如何培育健康的民族主義精神？
- 五、結語

第二章 敵友之界 人爲之念：個人、社會與中美關係的起伏 27

- 一、引言：流行的誤區
- 二、以史爲鑒之一：中國領袖的個人作用
- 三、以史爲鑒之二：美國總統的個人作用
- 四、歷史的現實啓示錄
- 五、中國需要怎麼看？
- 六、中國需要怎麼做？
- 七、我們可以說什麼？
- 八、我們可以做什麼？
- 九、結語

第三章 愛國主義：怎麼講 怎麼做 64

- 一、引言：理性的批判
- 二、中國人爲什麼要講愛國主義？
- 三、中國人應該如何講愛國主義？

- 四. 東西方文化有什麼衝突?
- 五.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美國?
- 六. 中美關係中有什麼文化上的誤解?
- 七. 結語

第四章 棄之不捨，用之討嫌：評美國媒體 97

- 一. 引言
- 二. 通過媒體看世界
- 三. 美國新聞觀
- 四. 美國好萊塢
- 五. 美國媒介與中美關係
- 六. 不是親家，便是怨家?
- 七. 結語

第五章 美國式教育下的美國與美國人 124

- 一. 引言
- 二. 美國社會：複雜多元的社會和理性的個人主義
- 三. 美國人的競爭、平衡與選擇
- 四. 美國的教育和美國人
- 五. 結語

中篇 政法與經濟

第六章 世紀之交中美關係的戰略思考 151

- 一. 引言
- 二. 美國還是超級大國嗎?
- 三. 未來中美關係的主旋律是什麼?
- 四. 中美外交的有效模式是什麼?
- 五. 中國盛世外交的主要危險是什麼?
- 六. 結語

第七章 法律之途隨想	174
一、引言	
二、從大陸法系到普通法系	
三、寧願錯放一千，不願錯殺一個——辛普森案及其他	
四、社會正義的基礎	
五、結語	
第八章 經濟制裁與冷戰思維	193
一、引言：刻舟求劍和國際經濟格局	
二、經濟制裁的一般常識	
三、經濟制裁的戰略研究	
四、經濟制裁的成功條件	
五、美中貿易戰分析	
六、貿易雙方的信息傳遞和決策過程	
七、結語	
第九章 互利雙贏：爭吵聲伴奏下的中美經濟關係	219
一、引言：經常拌嘴的伙伴	
二、天然的經濟伙伴	
三、再看知識產權爭端	
四、美中貿易不平衡問題	
五、最惠國待遇與世界貿易組織問題	
六、關於誰來養活中國的爭議	
七、結語	
下篇 國民與外交	
第十章 旅美學人：中美友好合作的橋樑	238
一、引言：中美關係走向穩定與成熟	
二、美國民衆對中國的基本態度	
三、旅美學人在中美關係中的定位	

- 四. 旅美學人的功能
- 五. 旅美學人在美國的發展方向
- 六. 旅美學人：連接二十一世紀中美友好合作的橋樑
- 七. 結語

第十一章 旅美學人應該怎麼做：邁向二十一世紀之際的中國 256

- 一. 引言：《中國可以說不》引起的議論
- 二. 非天堂非地獄的美國
- 三. 美國社會和美式教育的啓示
- 四. 危機感下的科教興國
- 五. 爲國服務三途徑：海外兵團、候鳥展翅和林茂鳥歸
- 六. “新僑”與“新橋”
- 七. 結語

第十二章 相克相生，相輔相成：美中關係面面觀 285

- 一. 引言
- 二. 美中關係中一些衝突的分析
- 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 四. 美國華人社團
- 五. 結語

附錄：美中事務委員會與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和
美國國務院官員的座談紀要

附錄一 容閔帶來的小留學生們 300

附錄二 中美關係展望 312

附錄三 中美關係多學科國際研討會側記 326

後記 335

第一章

知己知彼，求同存異：

由《中國可以說不》引起的思考

王希

王希，1982年畢業于河北大學英語系。哥倫比亞大學美國歷史學博士(1993)，哈佛大學杜波依斯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員和黑人研究系客座講師(1993-94)，現為美國賓州印地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成果包括：《The Trial of Democracy: 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 1860-1910》(Athen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1988-1989)。

一、引言

1996年5月，《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以下簡稱《說不》)一書在北京出版，立刻在海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有人拍手稱快，有人嗤之以鼻。直呼解氣者有之，痛加鞭笞者不乏。與此同時，海內外輿論竟相報導評論，贊成和反對《說不》的書籍文章源源不斷，滾滾而來。轉眼之間，“說不”成了中國最時髦的政治術語。

《說不》為何會有如此效應？我以為，這是因該書內容，寫作手段和出版前後的中美關係的特殊環境所致。《說不》是一本由五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作者策劃和寫成的議論性文集，議論的題目包括冷戰後的國際形勢和中美關係，中國的外交立場和策略，美國的民族素質和政治文化，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該書的主要觀點可以歸結為：(1)冷戰結束

後，國際戰略格局發生變化，中國實行深度改革開放，引起了美國和西方反華勢力的恐懼；美國爲了維持其在現行國際秩序中的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糾集國際反華勢力，利用經濟制裁、人權外交和插手臺灣事務的手段，在一連串問題上玩弄霸權主義，欺辱中國，破壞中國的發展，阻礙中國的統一；美國霸權主義是導致中美關係急劇惡化的根源。(2)美國是一個歷史短暫文化淺薄的國家，美國民族患有“極端自戀主義”；美國社會充斥落後與腐朽的文化，這樣一個素質低劣、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的民族，注定不能領導世界。(3)面對美國的圍堵和霸權主義，中國政府要敢于說不；爲了在國際社會中爭取更平等的對話地位和機會，中國要開展全方位的外交，聯俄聯法，要有勇氣拋開美國，並且要勇于當世界“窮國俱樂部”的頭兒。(4)中國人要挺起腰杆，反對崇洋媚外，堅決抵制美國精神和文化對中國的侵蝕和進攻；中國人要銘記被人欺侮的仇恨，要敢于沉浸于中華民族的“大國式的美”之中，堅決不要怕當超級大國。

該書作者稱，《說不》不是一份“民族主義宣言”，也無意確立“中國在未來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位置”，他們的目的是爲了“映射”目前中國存在的“廣泛的民意”。爲了淋漓盡致地表現這種“民意”，作者們採取了一種相當情緒化的寫作方式。雖然作者們對一些問題的觀察不無深刻有理之處，但他們提出的許多觀點卻沒有經過嚴格的論證，也沒有可靠材料的支持，大部分結論是有感而發，充滿個人情緒。該書言辭尖銳犀利，觀點鮮明極端，結論絕對肯定，情緒洶湧澎湃，文風頗似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大字報。顯然，作者並不打算寫一本立意深刻、結構嚴謹、史料詳實、文字嚴肅的著作，而是追求一種精神上的大徹大悟，一種情感上的自由渲洩。他們似乎並不是要與自己批判的對象進行一場理性的辯論，而是要借此機會發出一聲捂着傷口的吶喊，一陣刺激對手的狂罵，一場刻骨銘心的震撼。

暫且不論《說不》的觀點是否言之有理，或其寫作手段是否得當，至少在兩個意義上，《說不》的出版代表了一種新的中國政治文化現象。首先，《說不》突破了中國百姓對國家外交政策保持沉默或不予置評的傳統。近二十年的改革開放使全國上下思想大解放，但民間置評國家外交政策的空間仍十分有限。《說不》能如此毫無顧及地點評中國的

外交政策，如此聲色俱厲地指責中國重要的外交對手美國，如此大張旗鼓地宣揚大國民族主義，實為鮮見之事。其次，長期以來，美國輿論界對中美關係和中國的發展評頭論足，說三道四，盡管許多的評論充滿了無知和偏見，嘲諷與鄙視，然而中國的回應權卻永遠掌握在新華社手中，民間從來沒有機會予以放膽回應。《說不》的放蕩不羈打破了中國人傳統的溫文爾雅，對美國媒體來了個“以毒攻毒”，也使美國和國際輿論聽一聽中國民間的聲音。恰恰因為《說不》採用了極端的立場，喊出了極端的口號，運用了極端的表現方式，它才能在出版後在海內外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說不》的作者為什麼要寫這本書？為什麼選擇這種方式來寫作？為什麼偏偏選在中美關係出現一連串僵局和衝突並處於低潮的時候策劃寫作和出版這本書？《說不》的真實意圖何在？它追求的效果是什麼？是作者們為了欺世盜名，嘩衆取寵，刻意煽動反美情緒，還是被當前商業浪潮衝昏了頭腦，粗製濫造，以求發一筆暢銷書的橫財？他們是負有某種特殊使命，利用民間渠道來表達官方的立場，還是出于中國青年知識分子的良知與責任，對美國霸權主義行徑忍無可忍，要拍案而起，殺殺美國人的囂張氣焰，為中國人打一針精神興奮劑？是中國知識分子在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對美國和西方有了較為清醒和現實的認識，決心痛定思痛，徹底批判自己過去的親美崇美情結，並要矯枉過正，給國人崇美崇洋的行為和心態潑上一盆冷水，提醒國人不要徹底變成美利堅的精神奴隸？還是作者們刻意要突破舊的政治模式，要求在涉及國家利益的重大問題(包括外交政策的制定)方面行使公民應有的發言權？

無論把《說不》看成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覺醒或思過，還是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發洩，還是一種與官方政策異曲同工的民間聲音，還是國內學術商業化浪潮中的一個怪胎，其實並不重要。《說不》完全可能同時包含了上述各種背景。重要的是，《說不》能夠在中國出現，變成暢銷書，在無數普通中國百姓和知識分子中引起強烈共鳴，並得到海內外輿論的重視。《說不》的轟動說明它所代表的不僅僅是幾個人的思想和情緒，而至少是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思想和情緒，也就是說，它確實反映了中國人對中美關係、美國歷史和文化、中國的民族主義等一系列重要問題的認知上的一種“廣泛的民意”。這種“民意”顯然是值得重視的，值得加以分析和認識的。

我必須承認，《說不》的作者是敏銳的，他們對一些問題的觀察是發人深省的。但《說不》是以情緒的渲洩來代替理性的批判和認知。這種方式可能滿足作者自己或某些讀者的精神需要，但同時也會造成許多負面的影響和效果。《說不》討論的問題重大，但作者們並沒有對這些問題作過專門研究，沒有對所論的許多歷史事實作深入的調查，沒有對提出的觀點和結論進行仔細的推敲，在許多地方還因使用了不恰當的材料，作出了與實際事實大相徑庭的結論。這樣的結果是誤導了讀者，尤其是誤導了那些在情緒上與《說不》作者自身情緒接近的讀者。我並不認為《說不》作者是刻意要誤導讀者，他們顯然希望用事實來說話，但遺憾的是，他們的研究作得非常表面和膚淺，更多的時候，他們寧可讓自己的情緒來主導自己的思路。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有必要對《說不》議論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一些思考。這些問題包括：(1)冷戰後時代中美關係應如何定位？(2)如何認識美國？(3)如何培育健康的民族主義傳統和精神？

二、冷戰後中美關係應如何定位？

《說不》的作者們在多個章節中對中美關係發表了評論。根據作者們的觀點，冷戰結束後，美國因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自命不凡，利用其軍事優勢和經濟影響，對世界事務指手劃腳，對不聽其指揮的國家，動輒經濟制裁，威逼恐嚇；美國的對華政策，依然以冷戰思維為主導，視經濟成長迅速的中國為潛在的威脅；為了遏制中國，美國拋出“中國威脅論”，意在引起中國週邊國家的恐懼，為其組建新的反華俱樂部製造輿論。作者舉出美國在一系列與中國發展有關的問題上製造的種種障礙，包括在最惠國待遇問題上要挾中國，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漫天要價，並在一連串的外交事件上（包括銀河號事件，中國申辦奧運會，李登輝訪美，臺海危機）欺辱中國。中國如何對付美國的挑戰和遏制？作者們提出了這樣幾種策略：(1)“撇開美國”，建立和加強中俄聯盟，抵制和消除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影響；(2)以經濟制裁反經濟制裁，抵制美貨，不吃美國糧食，不看美國電影，把中國經濟發展的訂單交給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家；(3)開展全方位的外交，聯合世界上的中小國家，組

成窮國俱樂部，與富國抗衡；(4)開展務實外交，以“現實的利益”為外交的基礎，在統一問題上絕不後退半步，如果美國敢于插手臺灣獨立，中國必須予以迎頭痛擊。

平心而論，《說不》對1989到1996年間中美關係出現的障礙並非信口開河，對美國霸權主義心態的批判也不完全是無的放矢。事實上，稍微回顧一下近150年來的中美外交史，我們可以看到，在兩國交往中，美國一向是以強者自居的。中美關係中的不平等直到1979年後才開始真正得到改變。十九世紀中葉，美國就曾與英法俄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一起，用武力“打開”中國之門，並在1860年脅迫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獲得了在中國的特權，在中國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為了防止歐洲各國在自己羽毛未豐之前進一步瓜分中國市場，美國在十九世紀末提出了西方各國列強之間要實行合作，共同管理中國，繼續維持沒落的清政府的統治，提出中國門戶對所有列強均等開放的要求。“門戶開放”政策名義上是維持中國領土和體制的統一，實質上是保證美國能得到同等機會進入中國市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民族自決”和公開外交等主張，意在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增加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影響力，但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迫于英法日的壓力，同意將原來由戰敗的德國佔領的中國領土膠州灣轉交給日本佔領，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利益，換取日本對國聯的支持。美國參院後來否決了凡爾賽和約，表面上的理由是威爾遜的讓步違背了美國對中國的義務，實際上是不滿意美國從和約中獲得的利益太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美為抗擊日本成為盟友，但隨着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勝利和東西方冷戰的開始，中美關係發生變化，兩國長期對立。直到1972年，為了打破國際政治中的僵局，在越南戰爭、柬埔寨問題、與蘇聯抗衡等問題上尋求出路，雙方開始建立對話關係，並在1979年正式建交，中美之間的交流全面展開。但因歷史原因，美國在臺灣問題保留了事實上的發言權，加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正常化後的兩國關係並不牢固，時有起伏。但在冷戰時期，因雙方對於共同利益的重視，這種分歧沒有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擺脫原有意識形態的約束，大張旗鼓地學習西方技術，運用西方市場經濟的規律，經濟發展迅速，開始進入了由西

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並開始產生一定的影響。中國崛起之快出乎美國的意料之外，盡管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遠不能與美國經濟同日而語，但中國廣闊的市場、巨大的人力資源和雄厚的初級技術資源都預示着中國經濟的巨大潛力。對於中國的崛起和可能在未來世界經濟中佔據的重要位置，美國人的心態是複雜的，雖不願意承認但又不得不面對。與此同時，世界政局發生了重要變化，東歐和前蘇聯的政治變化，導致了冷戰的結束，美蘇兩極對抗消失，中美之間的分歧開始突顯。面對中國的發展和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政治動蕩，美國朝野的確有一些人堅持用傳統的眼光來看中國，使用冷戰時期的語言，拒絕承認中國改革以來在意識形態、政府功能、經濟結構、生產能力、人民精神面貌方面發生的革命性變化，拒絕認為中國有權和有能力選擇自己認為是最有效的進入國際社會的道路。正如《說不》的作者們注意到的，美國輿論中出現了像查爾斯·克勞特哈默那樣公開疾呼對中國進行遏制的聲音，也出現了包括衆議院院長紐特·金里奇在內某些議員提出的支持顛覆中國現政府的談話，美國的確也使用了手中的“王牌”，在臺灣問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問題上，製造了一系列障礙。

但這些美國言論與行為是不是就代表了當前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的主流？是不是意味着美國已將與中國為敵定為美國下一世紀的國策？中美之間的衝突是不是已經到了必須刀刃相見的時候？我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我不否認中美關係的根基並不牢固，可出問題的環節很多。中美之間在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各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異，要求任何一方在短時間內放棄自己的傳統，按照對方的意志行事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我不認為這些分歧和差異的存在意味着雙方除了對抗沒有別的出路。

事實上，如同《說不》一書中引用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在1996年4月對中美關係的談話所示，美國朝野除了“遏制派”，還有不少頭腦清醒和冷靜的人。這些人對中國的改革和發展有比較客觀和現實的認識。他們清楚認識到中國的改革已經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體制和政策調整，而是成爲一種對中國本身和世界都有重要影響的運動。與所有關心美國在下一世紀的地位的美國人一樣，這些人也憂慮和擔心中國發展對美國地位將造成的衝擊，但他們並不贊同對中國進行孤立和遏制。1996年美

國總統大選結束後，美國學術界的中國問題專家與一些重要的商業界和政界頭面人物在紐約召開了題為“二十一世紀的美中關係”討論會，經過討論，為克林頓政府提出了一份題為“共建未來，發展合作，縮小分歧”的對華政策建議。這份建議認為，美國和中國在下一世紀中必須採取合作態度，理由是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穩定和繁榮有密切關聯。建議指出，如果中國經濟不能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部分，全球經濟自由化和繁榮化將不可能成功；而沒有世界經濟的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也不能成功；如果中國經濟改革失敗，勢必將影響中國政治改革的進步和人權狀況的徹底改善，最終將影響世界局勢的穩定。與會者呼籲美國政府，對中國應採取合作的策略，而不是孤立和圍堵。文件還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包括美國應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與中國在東亞的軍事安全問題上展開對話，停止天安門事件後對中國的種種制裁，關注香港的回歸，並盡快展開兩國首腦的會晤。從第二屆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來看，這份建議提出的相當一部分內容被採納了，而其中最具影響的應是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1997年對美國的訪問以及克林頓總統於1998年6月對華訪問。這說明美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並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遏制戰略。

美國究竟對中國採取什麼樣的外交政策，是遏制還是支持，實際上這並不是任何一個美國政治人物或某家美國報紙說了就算的事。冷戰結束後，世界政治和經濟格局發生重要變化，和平的可能性增加，意識形態的對立正為經濟領域中的競爭所取代，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在調整自己的國際戰略方針，重新審定自己的戰略目標，識別潛在的朋友和對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為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存在，新的世界秩序遠未形成，敵我友分野並不明朗。與其他國家一樣，美國也在調整自己的外交，調整的最終目的，是保證美國國家利益的安全和發展。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美國並沒有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戰略，既沒有一個長期的戰略方針，也沒有一套完整的戰略思想；如果說美國在國際政治中有什麼歷屆政府都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的話，那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國家利益從來就是國際政治的核心原則，是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在國際交往中都不能犧牲和無視的原則，即便是在意識形態色彩最濃的冷戰年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主動犧牲自己的國家利益而遷就他人的。所以，在分析和討論美國對華政策走向時，不能忽略了“國家利益”這個核心要素在其中起的決定性作用。

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到美國外交政策形成的兩個特點。首先，美國的外交政策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或者說，是依國家利益的需要而制定和調整的，但“國家利益”的內涵是不斷變化的。從美國建國一開始，保衛和擴展國家利益便是美國的外交宗旨。十九世紀的美國在實力上不敵歐洲帝國，現實地提出了“門羅主義”的口號，奉行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將自己的影響限于美洲。本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美國有機會發展成為超級大國，影響遍及全球，直接好處是得到了廣大的市場和廉價的資源，為美國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富有奠定了基礎，也幫助緩解了美國國內的階級和種族矛盾，推動了美國社會內部的進步。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因此擴展成為一種世界範圍的利益，為了維持和繼續擴展既得利益，美國必須不斷插手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事務。1991年的海灣戰爭，一方面是為了懲罰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行動，但更重要的是為了保證美國繼續得到中東廉價的石油。認識美國“國家利益”內容的變動性和世界性十分重要，這可以幫助我們比較準確地把握美國國家利益的內涵。

另一個特點是美國外交決策的機制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並時常與美國國內的政治——黨派政治或行政與立法部門的權力之爭糾纏在一起。根據美國憲法，總統負責外交，但這並不意味着祇有總統才能制定外交政策。作為最高行政長官和美國的國家代表，總統在外交上當然有極大的權力，但美國外交政策的產生卻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任何一項外交政策的制定都要受到體制內外各種因素的牽制和影響。國會和政黨有相當大的權力和機會影響甚至決定外交政策。在遇到緊急情況（如發生威脅美國利益的戰爭）時，政府各部門和朝野黨派之間常常能夠密切配合，暫時拋開異見，統一看法，為保衛美國利益作出一致的決定，如在1964年，約翰遜總統的國內改革政策在國會內頗受阻攔和非議，但他入侵越南的政策卻得到國會絕大多數議員的堅定支持。在和平時期，外交政策常常被牽扯進黨派和部門政治中，成為國會和總統相互要挾的工具，或討價還價的籌碼。如雙方都不妥協，外交政策便遭殃，這樣的例子在美國歷史上是很多的。上面提到的凡爾賽和約的批准便是其中一例。七十年代初，尼克松政府採用了近乎秘密外交的方式，打開了中國之門，震驚了世界，但有些國會議員卻對總統這種一手遮天的方式頗為不滿。在